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史学研究丛书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切偲集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沙龙论文集

第二辑

执行主编 张 玮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切偲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沙龙论文集.
第二辑/张祎执行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4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8711-7

I. ①切… II. ①张…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9697 号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丛书

切偲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沙龙论文集(第二辑)

张 祎 执行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1.75 插页 2 字数 368,000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711-7

K · 2425 定价: 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编 委 会

(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崔金柱 顾江龙 李永斌 刘 屹 秦 方
孙正军 田 天 王 铭 殷志强 游自勇
翟 韬 张天虹 张 祎

序

——青年教师要树立“为往圣继绝学”的志向

郝春文

世界各国大学教师的生活都差不多，都是整天忙乱不堪，因为要兼顾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所以，作为中国大学教师，工作忙一点、累一点，没什么值得抱怨的。

但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大学教师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收入水平偏低，青年教师尤甚。既要忙于教学，又要忙于科研，收入又低，我们应该有资格发点牢骚，也有资格抱怨。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却没有人对我发过牢骚，我也没有听到过抱怨。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们的内心，是什么精神使他们的内心如此强大？这是我一直在琢磨的问题。

我曾经和一些青年教师私下聊过一个看法，得到了认同。这就是多数大学教师的生活目标似乎和世人有差异。世人多以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为主要目标，我们的大学教师虽然也不排斥更好的生活，但其主流却未把谋求更好的生活当作主要目标。应该说明，以上两类追求并无正误之分，都属于正确的选项。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让生活更加美好，没什么不对的。但这两种追求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一般大学教师的心理状态应该是通过自己教学和科研的业绩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就决定了他们不会像世人那样把挣钱多少、房子大小作为衡量一个人地位的唯一标准。在多数大学教师眼里，你住的房子再小、工资再低，但只要教学和科研业绩特别突出，就能赢得大家的尊重；反之，房子再大、存款再多，也照样没地位。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高尚”来形容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但确实是这样一种氛围使得中国的大学教师群体能在相当不利的环境里支撑下去。这或者可以看作古代士人“君子谋道不谋食”的当代表现吧。

我们的另一个心理支点是喜欢这份事业。在大学教师的生活中，

也常会遇到挫折和逆境，在这样的境遇下，我们的心潮也会起伏也会低落。但因为我们喜欢自己的工作，心情再差，我们仍然会去教书、看书和写作。所以，顺境和逆境不但不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反而是努力工作可以帮助我们尽快走出逆境。我曾经多次在内心做过权衡，虽然大学教师整天处于忙乱之中，也不富裕，但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这份事业。

正因为我们喜欢自己的事业，又有着和世俗不同的价值追求，所以首都师大历史学院的教师多年来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青年教师是我院教学和科研的生力军。这批由 70 后、80 后组成的青年教师队伍，人数已达 44 人，已经成为专业教师的主力。他们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扎实的基本功，在国内有很好的口碑，被寄予厚望，是我们学院未来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这批人大部分是我主持引进的，我和这批人的关系可以说是休戚与共。他们成功了，就证明我有知人之明，那将是我最大的成功！所以，没有人比我更关注他们的成长。他们每发表一篇优秀论文、出版一部高水平的论著，我都会由衷地高兴。这样的心境，其他人或许很难理解。正因为如此，我也对这批教师有着更高的期许，希望他们都能成为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最终都能推出无可替代的学术成果。

现在的学术评价体制具有很强的短期性和功利性，不利于青年教师安心创作无可替代的原创性的成果。因为创作这样的成果往往需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生的不懈努力。所以，希望我们的青年教师能在一定意义上超脱目前的评价体制，以“为往圣继绝学”的志向从事学术研究。多想想你能在学术史上留下些什么？你的成果过一百年、一千年甚至一万年还会有人参考？

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的青年教师能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起来，将阶段性工作和毕生学术目标结合起来，取得当世和后世的双赢！

产生无可替代的成果，个人的努力和勤奋当然是必要条件，但互相切磋砥砺也是必须的。首都师大历史学院史学沙龙就是我院青年教师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这个沙龙以讨论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为主，先由作者对论文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然后与会的师生对论文进行评议和讨论，讨论的结果往往对作者修改论文有很大帮助。这个沙龙自 2013 年至今已成功举行了 50 多场，极大地活跃了我院的学术气氛，对于提高青年教师的学术水平、加强友谊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最近，史学沙龙的组织者将部分经过讨论和发表的论文结集出版，执行主编游自勇君索序于我。我虽然未能参与

沙龙的活动,但一直关注着它的动向,更为他们的坚持和进步而高兴。所以,我很愿意在这部论文集的前面写几句话。

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这就是我院的青年教师!生活虽然清贫,但大家却甘之若饴,醉心学术。多么好的青年教师啊!套用魏巍的散文,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是为序。

2016年10月9日

目 录

序	郝春文 (1)
略论西汉初年的儒生形象	
——从“复为新垣平”谈起	田 天 (1)
中国古代良吏书写模式的确立	
——从《史记》《汉书》到《后汉书》	孙正军 (16)
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	胡 鸿 (44)
晋唐间的晋史编纂	
——由唐修《晋书》的回溯	聂澹萌 (78)
“开皇”年号与道教的“劫运”思想	刘 屹 (96)
敦煌写本 S. 2078V“史大奈碑”习字之研究	游自勇 赵 洋 (117)
唐代内府的别书人	李芳瑶 (136)
政治的表达与实践：田氏魏博的个案研究	仇鹿鸣 (147)
唐代城市环境管理初探	
——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考察	张春兰 (177)
城居的日常：唐代城市日常生活相关研究述评	
——兼论在城市史研究中探讨日常生活的路径	万 晋 (199)
明代嗣雅堂钞本《唐书》的文献价值	夏 婧 (212)
《神宗御集》考	
——兼论北宋君主御集的编纂与用途	周 佳 (246)

司马光《潜虚》的世界	方诚峰 (260)
大德二年(1298)伊利汗国遣使元朝考	
——法合鲁丁·阿合马·惕必的出使及其背景	邱轶皓 (285)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沙龙简介	孙正军 (329)
作者名录	(338)
后记	(339)

略论西汉初年的儒生形象

——从“复为新垣平”谈起

田 天

汉武帝初即位时，便对儒学怀有强烈的兴趣。时任丞相、太尉的重臣窦婴与田蚡也“俱好儒术”，他们推举赵绾、王臧二人担任御史大夫和郎中令。在窦婴与田蚡的支持下，赵、王二人共同推动了一系列以儒家学说为出发点的举措：“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①这些措施，尤其是敦促列侯就国的建言，引起了众多外戚的不满。最终触怒窦太后的，是赵绾请求“毋奏事东宫”一事。《汉书·田蚡传》载：

〔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乃罢逐赵绾、王臧，而免丞相婴、太尉蚡。^②

这一提议直接触犯了窦太后的权威，导致了前述一系列改革计划的失败，赵绾、王臧因此获罪，窦婴、田蚡也被免官。

《史记》《汉书》所载赵绾、王臧改革及其失败的文字相当简短，这一事件的背景却十分复杂，牵系着武帝初年微妙的政治形势。武帝少年即位，核心权力的分配因此有了重组的可能性。武帝之母王太后及其背后的王氏外戚集团，有机会进入权力中心，分享景帝母族“诸窦”所获得的利益。赵、王二人之兴废，即是外戚角力中的一次试探与冲突。窦太后察觉到“贵在日月之间”的田蚡及其代表的王氏势力，借“推轂儒术”之机，任用新人、改变政

① 《汉书》卷52《窦田灌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79页。

② 同上。

策导向。^①他们试图以此影响武帝、进入权力核心，同时削弱窦太后的权威。因此，窦太后做出了相当激烈的反应。^②

对于赵绾、王臧事件背后的权力角逐，逯耀东发之已详。本文更关心的，是史籍所载窦太后对赵绾、王臧的评价：“此欲复为新垣平邪？”新垣平是文帝时代影响颇大的方士，《史记·封禅书》载新垣平事迹曰：

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③

可见，新垣平所为多幻术预言之类。西汉时人也将他与武帝时的诸多方士并提，如成帝时谷永曰：“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④窦婴、田蚡“俱好儒术”，赵绾、王臧皆是儒生，但窦太后以为他们与“以望气见上”的新垣平行事相似。个中缘由，值得发明。

窦太后的考语，使我们注意到汉初儒生热衷的一些话题，如改正朔、易服色、设明堂、行封禅等。不过，这些话题并非儒生的专利，方士、阴阳家与其他学派也皆持此论，只是进入的角度不同。汉初的儒生在持论、行事上常有与其他学派相同或接近之处，和元成时期礼制改革中旗帜鲜明的儒生形

① 逯耀东已敏锐地指出，田蚡与窦太后的冲突，“表面上是一次儒术与黄老政治理念的冲突，实际却是新崛起的王氏外戚集团，向长久掌握权力的窦氏集团，尤其窦太后的权威挑战而引发的”（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12—113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推毂儒术”，任用赵绾、王臧的幕后，除了代表王氏势力的田蚡，还有属于窦氏家族的窦婴。关于这一点，逯耀东认为，窦婴为丞相，是由田蚡促成，使其作为自己与窦太后之间的缓冲，田蚡才是这次政治斗争的实际主持者。这一看法有其合理性。不过，窦婴虽为窦氏族人，但其地位与行事常与“诸窦”不同，很难泛泛地将其归入与窦太后进退一致的窦氏外戚势力。如窦婴因梁孝王刘武事与窦太后正面冲突，其后又因栗太子事件与景帝生隙。赵绾、王臧事件发生后，窦太后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而窦婴并未因此起复，而是从此远离了权力核心，也能够证明这一点。窦婴在这次改革中所起的具体作用，还有讨论的空间。窦婴在本次事件中的地位也说明，对此事的解读，似不能全以权力集团斗争的视角考察，还需注意文化、思想的层面。

② 逯耀东还指出，窦太后将文帝祠五帝、作王制等事，与田蚡为主导的改制相提并论，可知田蚡改制的真正目的。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第113—115页。

③ 《史记》卷28《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83页。

④ 《汉书》卷25下《郊祀志下》，第1260页。

象颇为不同。这种变化,涉及儒学内部的发展与完善,这超出了本文所能容纳的范围。下文尝试从外部对西汉初年儒生的持论与形象略做探讨。

一、西汉初年的“改正朔、易服色”

《史记》中有多处文字记载了赵绾、王臧的改革举措,《史记·封禅书》载:

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①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载此事曰: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②

两种记载相拼合,可以较为完整地复原出武帝初年赵绾、王臧所倡议的主要改革措施: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巡狩封禅,令列侯就国、除关等等。这些改革有推重君权,遏止外家势力的意图。不过,其重点还在于“改历服色”。

所谓的改正朔、易服色,并非新兴之论,文帝初年学者已发其议,可说是西汉初年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文帝时代的改正朔、易服色等改革,由祭祀改革领起,新垣平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前元十四年前后,文帝一度对祭祀事务颇为关心。《史记·孝文本纪》叙曰:“(前元十五年,)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③这是西汉第一次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五帝祭祀。在文帝首次赴雍地祭祀五帝之后,新垣平出现在祭祀改革的进程中。《史记·封禅书》载:

①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4页。

② 《史记》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3页。

③ 《史记》卷10《孝文本纪》,第430页。

其明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①

在新垣平的建议下，文帝在长安东北立五帝庙。渭阳五帝庙成为国家规格最高的祭祀场所之一，与雍五畤相同。新垣平由此大贵，被封为上大夫。继而，他还参与了立长门五帝坛、泗水寻周鼎等事。《汉书·文帝纪》载前元十六年，“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②文帝十三年开始持续进展的祭祀改革，至此达到顶峰。不过，仅一月之后，新垣平便因作伪被人告发：

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③

新垣平事件带给文帝重大打击，持续了数年的祭祀改革从此中断。文帝朝的这一系列祭祀改革，是在新垣平的推动下达到高峰，也因新垣平事败被诛戛然而止。

新垣平鼓动文帝广立新祠之用意，并不仅在于影响国家祭祀。文帝朝五帝祭祀的发端与兴盛，与文帝改正朔、易服色的意图直接相关。新垣平得以贵幸，也在于他推动了改正朔的进程。文帝前元十四年，鲁人公孙臣上书，以为汉得土德，要求改正朔、易服色，被丞相张苍驳回。至次年前元十五年，便有“黄龙”见于成纪：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于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违以劳朕。”……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④

①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2页。

② 《汉书》卷4《文帝纪》，第128页。

③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3页。

④ 《史记》卷10《孝文本纪》，第430页。

文帝十五年“黄龙见成纪”的真相到底如何,已无法查证。不过,“黄龙”出现后文帝立“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①而“张丞相由此自绌,谢病称老”。^②自此,改正朔一事提上了文帝朝的日程,前元十五年,“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③

文帝首次雍五畤祭祀后,儒生公孙臣便消失在改正朔的进程中,新垣平开始大为活跃。他先建议文帝设立渭阳五帝庙,又劝说文帝寻找失落的“周鼎”。《史记·封禅书》载:

〔新垣〕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④

战国以下,周鼎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符号,指示着天命转移之所在。秦始皇统一后也曾特意行经彭城,“欲出周鼎泗水”,^⑤以寻求政权正当性的佐证。文帝此番求鼎,涵义与之相近,是为了确认“天命”所在,与“易服色”直接相关。此外,文帝还“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⑥《汉书·艺文志》中无《王制》篇,今本《礼记》之《王制》与文帝使博士所作《王制》之间有何关系,学者聚讼未决。^⑦但西汉中前期学者所制《王制》中包含大量的巡狩封禅的内容,则无可疑。《封禅书》载: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

①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1页。

② 《史记》卷96《张丞相列传》,第2682页。

③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1—1382页。

④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3页。

⑤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8页。

⑥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2页。

⑦ 陈苏镇认为:“今本《礼记·王制》篇应当是由文帝所作《王制》发展而来的。”陈苏镇:《〈春秋〉与“汉道”》,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2页。任铭善则认为,文帝使博士所作《王制》并非今本《礼记·王制》。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11—12页。钱玄说与任说相同,认为“或汉博士另有言封禅、巡守(按,原文如此)之王制”。参钱玄、钱兴奇:《三礼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44页。此外,古人还有以《王制》为文帝博士所作(卢植、孙希旦)、秦汉之际所作(孔颖达)、作于战国时(郑玄)等说法,廖平等人则认为《王制》是孔子所作。王锴:《〈礼记〉成书考》有详细引述,此不具引。参王锴:《〈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1—187页。

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①

群儒定武帝封禅之仪，其理论来源就有《王制》。^②刺六经作王制，是文帝兴五帝祭祀的后续。从祀五帝、寻周鼎、作《王制》、议封禅等举动，不难想见文帝的用意所在：改正朔、易服色，悉除秦法，更立汉家制度。文帝的改革虽然没有成功，但在前元十四年至十六年前后，这一系列改革是当朝的重大事件。从这三年间行事的密度，也可读出文帝当时的热情。

回头再看赵绾、王臧所提出的一系列举措中，正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等事。毫无疑问，正是“改正朔、易服色”这个关键词，让窦太后回想起文帝时代那一系列改革举措，并将赵绾、王臧与当时的新垣平模拟。在窦太后看来，新垣平才是那一系列改革的“主谋”。

虽然窦太后下了如此断语，但文帝朝兴起改正朔、易服色之议的，却非方士新垣平，而是儒生贾谊。赵绾、王臧的改制计划，与其说与新垣平有相类之处，不如说与贾谊的看法更为相近。《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③

《屈原贾生列传》下文载曰：“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④文帝朝许多积极的东方政策都出自贾谊之手，改正朔、易服色也是贾谊所持的诸多改革提案之一。赵绾、王臧推行的政策可谓与贾谊一脉相承。就此推论，说改正朔、易服色是汉初儒生所关心的事业，应大致无误。

贾谊提议改正朔、易服色正在文帝即位之初，当时文帝的反应是“谦让未遑”。贾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国家安定，时机成熟，到了更除秦法、确立汉法之时。在贾谊看来，改正朔的基础是“天下和洽”，同时，改正朔也是治天下、致太平的重要一步。《史记·历书》亦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

①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97页。

② 今《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中有《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封禅议对》十九篇（武帝时）、《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小说家有《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09、1744页），其中可能就包括了当时《王制》的内容。

③ 《史记》卷84《屈原贾生列传》，第2492页。

④ 同上。

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①在汉人的理解中,改正朔、易服色的意义非常清晰:既是对过往施政的肯定,也是更立法式、开万世之治的开端。对这一点,儒生持之最力,贾谊就是其中之一。^②

贾谊虽然持论甚高,颇得文帝之心。不过,他年轻激烈,受到高帝功臣的打压,很快就被调离京师,改正朔之议也就此搁置。文帝前元十四年,鲁人公孙臣重提此事,最初为张苍否定。以《史记》的记载,张苍精于律历,推算后驳斥了公孙臣的说法。^③司马迁评论道:“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④指出张苍所本为《颛顼历》。事实上,正朔之争的主要原因,不是律历推定上的分歧,而是因为张苍与贾谊、公孙臣的知识背景与经历大相径庭,对“改正朔”一事的理解有根本差别。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⑤他出身秦吏,以为高祖既十月至霸上,则可从秦以十月为岁首。^⑥在他看来,汉得水德与天历时事两合,没有更改的必要。但对贾谊、公孙臣等儒生而言,改正朔关乎立国之本,不更秦则无以立汉。^⑦

虽然前文追述自贾谊以来的传统,证明改正朔、易服色等改革,是西汉初年儒家一直关心的议题。不过,身为方士的新垣平参与和推动此事,亦未必完全出于投机。自西汉立国至武帝朝,不同学派、背景的学者或官员,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与推动着这一事件。

先以司马迁为例,他虽曾学习儒家经典,^⑧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儒生。

① 《史记》卷26《历书》,第1256页。

② 贾谊对“礼”的强调,先贤多有论及,如徐复观:《贾谊思想的再发现》,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6—95页。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8—91页。陈苏镇曾将贾谊的政治学说总结为“以礼义治之”,参陈苏镇:《〈春秋〉与“汉道”》,第137—158页。

③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1页。

④ 《史记》卷96《张丞相列传》,第2685页。

⑤ 《史记》卷96《张丞相列传》,第2675页。

⑥ 《史记》卷96《张丞相列传》,第2681页。

⑦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甲……(荀)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陆德明撰,吴承仕疏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8页。按《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汉书》卷88《儒林传》,第3620页)并未明确说明贾谊与张苍间的传授关系,贾谊受《左传》于张苍之说,始于《经典释文序录》。贾谊与张苍间是否有师承关系,可能还需要更多证据。

⑧ 《史记·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3页。

司马迁本人也力主改正朔、易服色，^①他对此事的关注，不在贾谊等人之下。武帝时代改正朔的具体操作很大程度上出自司马迁之手。^②这首先是因为司马迁身为太史令，世掌天官，改正朔关乎正历法，是他的职责所在。^③其次，施政达到一定标准，才有改正朔的资格，也是当时的通识。^④因此他评价文帝“德至盛也。廩廩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⑤

讨论这一问题，还必须涉及儒生与方士之间微妙的关系。儒生与方士是汉代政治舞台上重要的两支力量，最先指出这一点的是顾颉刚。顾氏名作《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对西汉一朝儒生与方士的政治活动作了详尽的梳理与分析，在他的叙述中，往往将儒生与方士并提。^⑥儒生与方士确实共同参与了西汉初年的礼制改革，但如前所述，儒生对于改正朔有自己的理解，新垣平之祀五帝、出周鼎等等建议，则可能另有所据，至少看不出与儒生的看法相同。他们呈现出一些相似性，恐怕是因为儒家对“改正朔、易服色”并无独家解释权，儒生与方士可以在相同的话题之下各自发挥作用，地位平等。顾颉刚常将儒生与方士并提，也正可看出此时儒生的处境。

回顾前文所叙的“改正朔”之进程，不难发现，由贾谊始倡改正朔后，先有儒生公孙臣附议，再由新垣平推进，其后新垣平建议出周鼎，负责刺六经作《王制》的则是儒生。儒生与方士，在同一个话题之下各自施展，交替推动着改革的进程。人主不过择善而从，并不专主一家。就文帝而言，他对改正朔、易服色的热情，当然与贾谊、公孙臣等儒生的影响有关，但他的一系列改革，却并非遵循儒家成说，也很难看作是对儒学怀有兴趣。《史记·儒林列

① 《汉书·郊祀志》班固赞曰：“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仓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儿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汉书》卷25下《郊祀志下》，第1270页。

② 《汉书·律历志上》：“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汉书》卷21上《律历志上》，第974—975页。

③ 陈侃理认为，自文帝时的“改正朔”之议，也有实际的政治意义，即通过改正朔，将诸侯国所用历朔与汉朝统一起来，彻底将颁朔之制推行于天下郡国。陈侃理：《秦汉的颁说与改正朔》，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64页。

④ 除前文所引贾谊说外，《史记·礼书》中所载武帝时的官员也持相似的观点：“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史记》卷23《礼书》，第1160—1161页。

⑤ 《史记》卷10《孝文本纪》，第437页。

⑥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84页。

传》称：“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①司马迁的观察，应是准确的。在这次改革的中后期，方士出身的新垣平完全主导了改革的走向，甚至直接影响其兴废，儒生的影响几不可见。这应能说明，在文帝看来，儒生所谈的改正朔、易服色，与方士或其他背景的进言者并无本质差别。当时文帝皇后、后来的窦太后将赵绾、王臧与新垣平并提，也就顺理成章了。

综上所述，在西汉初年持续数十年的改正朔之议中，儒生虽然扮演着显眼的角色，但相比较而言，他们既不持有改正朔之说的“专利”，也并未作出更为系统或深入的理论支持，而是与其他学派分享着共同的资源与议题。无怪乎在窦太后看来，要求立明堂、改正朔的赵绾、王臧，与鼓吹祀五帝、“日再中”的新垣平没有本质的区别。对于理解西汉早期的儒生形象，这可能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角度。

二、儒与阴阳：模糊的边界

在与儒生共享资源与理论的诸说中，后代习称的阴阳家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类。儒家与阴阳家的关系，并非新鲜的话题。改正朔、易服色背后的五德终始说及其与邹衍学说之间的关系，顾颉刚发之已详，毋庸赘述。本文拟从与改正朔、易服色等礼制改革的角度略作申说。

立明堂与改正朔、易服色等同属西汉前期礼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如前所引，史籍凡提及立明堂一事，往往与改正朔、易服色并列。元封四年，武帝作明堂，于明堂中祭太一、五帝，又祀后土于下房。元封五年，武帝“春三月，还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②太始四年，明堂又增祀景帝。^③至此，明堂既有最高等级的祭祀，又有先祖配享，地位不同寻常。武帝之所以在泰山修造明堂，是因为相传泰山有旧明堂遗址。《孟子·梁惠王下》载齐宣王问孟子“人皆谓我毁明堂”云云。赵岐注曰：“谓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东巡狩朝诸侯之处，齐侵地而得。”^④武帝元封元年“登封泰山，降，坐明堂”，应即齐人侵鲁所得的“明堂”。颜注引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

① 《史记》卷121《儒林列传》，第3117页。

② 《汉书》卷6《武帝纪》，第196页。

③ 《汉书》卷6《武帝纪》，第207页。

④ 《孟子注疏》，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76页下栏。